

中国报业纵览

陈丽 主编



目 录

印证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报业	1
开国之初的新闻事业	55
大规模建设时期的新闻事业	71
一系列祸国殃民的新闻、评论	82
前景光明路曲曲	92
胜过三千支毛瑟枪的“口舌之剑”	121
报纸的读者工作	126
读者调查与读者研究	129
组织读者参与办报	130
充分发挥读者来信的舆论监督作用	133
多种形式的读者服务	136
报业的经营与管理	140
管理体制的演变	142
“邮发合一”与“自办发行”	144
报纸广告业务的发展	147
报纸技术更新改造硕果累累	149
实行一业为主的多种经营	151
改革劳动人事管理	152

印证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报业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有报纸的国家，手抄报纸、印刷报纸均最先出现在中国。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有着近一千三百年的历史。其间，先后出现过 6 万多种报刊、1000 多家通讯社、1000 座以上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新闻从业人员多达数十万人之众，其中著名政论家、记者有 1500 人以上。这在世界各国新闻事业史上都是少有的。从当代中国新闻事业上溯，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1.古代报纸的诞生和缓慢衍进；2.近代报业的传入和民族近代报业的兴起；3.现代新闻事业的形成和发展演变。中国新闻事业历史悠久，丰富多彩，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明史中的夺目篇章。

一、中国古代报纸的诞生和缓慢衍进

（一）古代官报——邸报的起源和衍进。

中国最早的古代报纸是邸报，它是历代封建政府传发的官报。在古代文献和著作中，邸报有多种别称，如邸钞、邸抄、阁钞、杂报、朝报、京报、钞报、进奏院状、进奏院状报或除目。中国古代报纸起源于何时，中外新闻史学者有不同说法。有的认为源于周朝，有的主张始于汉朝，但均缺乏必要的史实依据。一般公认而又较有可靠史实依据的说法是，中国的古代报纸开始诞生于唐朝。唐宣宗时中书舍人孙可之（名樵）所著《经纬集》中《读开元杂报》一文，为唐代报纸提供了最早的文字记述。文中记述作者曾于襄汉（今湖北）一带看到“数十幅书”，即几十张散页书面材料，“系日条事，不

立首末”，即按日记事，没有头尾，各页之间，互不衔接。内容多系皇帝和臣僚们朝政活动的消息。文章举有几条，即：“某日皇帝亲耕籍田，行九推礼。”“某日百僚行大射礼于安福楼南。”“某日安北奏诸蕃君长请扈从封禅。”“某日皇帝自东封还，赏赐有差。”“某日宣政门宰相与百僚廷争一刻罢。”并说这类记事，“凡数十百条”。这些散页没有任何刊头、落款和标识，可能由于所记均系唐玄宗开元十二至二十三年（七二四——七三五年）的事，孙樵行文遂加以“开元杂报”的称谓，意指有关开元年间各类政事的混杂报道，并非它的刊名。据此，多数学者公认，中国在唐玄宗开元年间（七一三——七四一年），即公元八世纪初就已出现了早期的报纸。

本世纪八十年代，学者专家们从敦煌文物中发现两份手抄进奏院状，分别是唐僖宗乾符五年（八七八年）和光启三年（八八七年）地方藩镇派驻京师的进奏官传发回地方藩镇驻地沙州的，内容记述了藩镇派往朝廷的专使们为地方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两次向皇帝请求赐给旌节的详细经过。这两份进奏院状长期存放在敦煌莫高窟中，本世纪初被英、法两国学者先后掠走。新闻史学家因此又称之为“敦煌邸报”。由于“开元杂报”没有保存下来，“敦煌邸报”的发现，为研究唐代报纸提供了实证。同时，这也是迄今世界上现存的最早的两份原始状态的报纸。

邸报的内容主要有：1.皇帝谕旨，2.皇室动态，3.官吏的任免奖罚，4.臣僚奏章等，没有一般的新闻和言论。历代封建王朝对邸报的内容都严加控制，在发布前均须经过严格检查。宋代曾实行由门下省给事中“判报”环节，一些重要稿件的取舍，往往由皇帝亲自决定。宋

真宗咸平二年（九九九年）起又实行稿件预检的“定本”制度，有关灾异、军情、朝廷机事和未经批准公布的臣僚章疏，均严加限制或禁止传报，严禁不利于统治者的内容刊出。

邸报只在封建统治机构内部发行，它的读者主要是皇室宗族和政府官吏，后来逐渐扩展，封建士大夫知识分子和地方豪绅富商也可看到它的抄件。到了宋代，邸报已成为朝野人士借以获知朝政的重要媒介，在社会上有比较广泛的影响。但是，一般广大平民百姓是看不到邸报的。

邸报一般没有报头。早期的邸报是手抄的。唐代每份只一张，长卷状。宋以后，改进为书册式，每份一小册，部分邸报开始使用雕版印刷。明代崇祯十一年（一六三八年）以后，广泛采用活版印刷。明顾炎武曾说：“忆昔时邸报，至崇祯十一年方有活版，自此以前，并是写本。”

明代的邸报是书册式日刊，每期一小本，字数一般在三五千字之间，期发行数，如计入各个环节抄传数在内，估计约为 5000 至 1 万本左右。长期以来，明代邸报仅存有抄件，即“万历邸钞”32 册和一份专门报道明熹宗天启六年（一六二六年）五月初六日北京内城发生特大灾异事件的“天变邸抄”。一九九三年，新闻史学者在北京图书馆发现万历八年（一五八〇年）四月二十二日出版的《急选报》一册，内容是及时介绍刊出被选拔的 162 名官员的姓名、籍贯和被任命的官职。这册雕版印刷，黄纸封面，印有黑框报头的《急选报》共 7 页。虽然纸质和印刷质量都不高，但它却是迄今仅存的一份明代报纸实物原件，也是世界上现存的最早的雕版印刷报

纸。

（二）民办小报的流传与被禁。

小报是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民办报纸。小报始见于北宋，流行于南宋。小报的发行人是一部分驻京师负责传发邸报的邸吏，中央政府机关中个别中下级官员和一些街市书店的主人。他们在宫廷内、政府机关中安置有“内探”、“省探”、“衙探”等探访人，目的是要他们为小报探听提供材料，然后再编成小报，委托书肆手抄或雕版印行。小报内容虽然仍主要是“朝廷之差除，台谏百官之章奏”，但多系“朝报未报之事，或是官员陈乞未曾施行之事”。即邸报未载或禁载，或先于邸报透露的独家新闻，很引人注目，为关心政局的官僚士大夫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些参考资料。小报没有固定的报头和名称，时人称之为小报，又被隐称为“新闻”。小报的消息，不完全可靠，不时出现虚假新闻，还曾发生伪造章奏的事件。在当时民族危机深重的情况下，小报被统治阶层中的主战派和各阶层爱国人士，用来刊登主张抵御外侮、收复失地、惩治汉奸的大臣奏疏，和有关抗金救亡活动的消息，成为主战派用以反对当权的主和派的一种宣传武器。

宋朝统治者严禁小报的流传，他们给小报加上“撰造浮言”、“乱有传播”、“肆毁时政”、“动摇众情”等罪名，宣布它为非法出版物而严加查禁，并缉拿重惩发行人，以期维持“国体尊而民听一”的官报独占局面。但直到南宋末年亦未能禁绝。元明清等朝，也出现过类似小报的出版物，称为“小本”、“小钞”或“报条”，同样遭到历代封建政府的查禁。清雍正四年五月，提塘报房小钞，因报道雍正游园活动失实，被朝廷下令追究，最

后以“捏造小钞”罪名将小钞发行人何遇恩、邵南山二人处以斩刑。这是中国新闻史上因办报获罪被杀的有姓名可查的最早两个人。

小报长期屡禁不绝，因为它适应了社会的一定需要，成为邸报的一种补充。小报揭开了中国民间办报历史的首页。

（三）明清的民间报房和京报。

十六世纪中叶，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明万历年间开始允许民间自设报房，出现“报房贾儿博锱铢之利”的抄报行业。这些私设的报房，在政府监督下翻印从内阁部门抄来的部分稿件，刊刻发售，可以公开叫卖和接受订户。这些报房最早出现在京城，因而它们发行的报纸，通称“京报”。京报的内容主要有宫门钞、上谕和章奏三大部分，基本上是邸报的翻版，有时也被混称为邸报。清代报房京报获准继续出版。到清末，北京出现有名号的报房十几家，有聚兴、聚升、合成、杜记、集文、同顺、天华、公兴、聚恒、洪兴、永兴、同文、信义、连升等。从业人员最多时有 300 多人。清乾隆、嘉庆等朝民间报房所出报纸，一般没有报头和封面，每天出一期，每期 1 册，每册 4—10 页，长宽约为 24×18 公分，在第一页和最后一页的空白处印有报房字号，被称为“白本报”。同治以后各朝，普遍用黄色连史纸作封面，并印有红色《京报》两字作报头，被称为“黄皮京报”，日刊或双日刊，每期 4—10 页，长宽约为 22×9 公分，线装书册式，文字竖排，一行到底，每行一般 22 个字，每页 7—9 行不等，每册字数，少时千字左右，最多有 5000 多字。用泥版或活字印刷，光绪末年以后，开始陆续采用铅印。

报房京报以牟利为目的，从经营到出版发行比邸报更近似近代报纸，但从内容说，它和邸报没有多少区别，仍然是封建统治者的传声筒。

（四）古代起义农民的新闻传播活动。

古代中国发生过大小几百次反抗封建统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农民起义。起义农民受物质条件的限制，没有条件出版报纸，但他们已经运用近似于报纸的工具和方式进行革命宣传。最初是用口头传播，有时还利用符、瑞应、讖纬、阴阳五行等带有迷信色彩的方式进行传播。唐以后的农民起义者经常在街市和公共场所散发预制的宣传品，时称“匿名帖子”。元末农民开始用带有鼓动性词句的旗子进行宣传。到了明末，李自成、张献忠所率农民起义军普遍利用揭帖进行宣传。这些揭帖有手写的，也有印刷的，和传单相似，起了动摇和瓦解敌人的作用。他们还广泛利用旗报和牌报进行传播，即在布旗和轻便木牌上书写鼓动口号、起义军政策和法令（如“免赋”、“均田”等），报道起义军的战果，以团结民众，震慑敌人，起了近似于报纸的宣传作用。古代起义农民新闻传播活动中表现的革命精神及其成功的宣传方式，对后来中国人民的革命宣传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报纸在历史上为当时的读者提供朝野政事和社会信息方面，起了一定的传媒作用。但是，作为古代官报的邸报，只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喉舌和御用宣传工具。民办的小报和报房京报，亦受着封建统治阶级的严厉控制，没有言论出版自由。加上封建自然经济的制约，所以古代报纸长期进展缓慢。鸦片战争以后，国门大开，面对近代新报的传入和兴起，从形式到内容已完全僵化的旧式邸报与京报，逐渐衰落。到清末民初，遂

为近代新式报刊所完全取代而消亡。

二、近代报业的传入和民族近代报业的兴起

（一）近代报业的传入和扩张。

在中国，近代化的报刊，是由外国人首先传入的。外国人在华办报活动的扩张，是和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入侵中国的进程紧密配合的。从十九世纪初到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外国人在中国先后创办 200 多种中外文报刊。其中，中文报刊约 80 多种，外文报刊约 130 多种，占据中国报业的垄断地位。

以鸦片战争为分界线，从一八一五年到鸦片战争前，是外国近代报刊传入的开始阶段。这一阶段外国人共出版中文报刊 6 种，外文报刊 17 种。其办报意图是为打开中华帝国的大门作舆论准备。首先来华办报的，是一批英国基督教传教士。由于当时闭关锁国的清政府严禁外国人在中国传教和印书，因而外报的传入最早是从临近中国的南洋群岛一带开始，再逐渐向澳门外国人居留地和广州商馆区渗透的。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第一个中文近代刊物。一八一五年八月五日在马六甲出版，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主持创办并担任编撰，刻字工中国人梁发参与部分工作。该刊以中国人为宣传对象，雕版印刷，每月出 1 册，约 2000 字，中国线装书式。它宣称“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刊物大量刊载介绍基督教教义和《圣经》的文章，并附会以中国传统的儒学伦理道德观念的说教。每期封面都印有：“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和“博爱者纂”字句，也介绍一些日月星辰、地球运转方面的知识，但又把这些自然界客观现象说成是神赋予的。该刊初印 500 份，后增印到一二千份，除向当地和周围

华侨聚居区免费散发外，中国境内亦时有输入。出至一八二一年停刊，共出7卷80多期。

相类似的刊物还有《特选撮要每月纪传》（一八二三——一八二六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一八三三——一八三七年）等。其时，西方殖民者尚未在中国站稳脚跟，《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等第一批中文刊物，多以宣扬宗教的姿态出现，极力宣扬基督教义，传播西方的工艺知识，鼓吹“四海皆兄弟”、“万国一家”，借以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消除中国人民对外国侵略者的戒心。

第一批外文报刊中，英文报刊占据首位，多为商人出资创办，但政治性明显。主要有《广州纪录报》（一八二七——一八四五年），由英国大鸦片商马地臣创办，马礼逊任主要编撰人。《中国丛报》（一八三三——一八五三年），由美国在广州的巨商奥立芬资助创办，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主持编务，马礼逊等参与编撰。不同于中文报刊的是，这批外文报刊以侨居中国的外国商人、传教士、外交官为读者对象。他们毫不掩饰其侵略者喉舌的面目，公开为鸦片贸易辩护，鼓吹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直至发动侵华战争。有的还担任提供情报的任务，刺探和大量刊登有关中国政治、军务、经济、文化、社会风俗各方面的情况和材料。有的充当西方人士讨论对华政策的舆论阵地，发表大量文章，为入侵中国出谋划策。

鸦片战争后，西方殖民征服者凭借不平等条约，取得在中国境内任意办报的特权，外人在华办报活动进入迅速扩张阶段。从沿海大城市伸入内地各通商口岸，直至进入腹地清廷首府北京。从一八四〇年到甲午战争的半个世纪中，外国人先后出版中文报刊约70种，外文报刊百余种（除少量葡文、法文、德文、日文报刊外，大

部分是英文的),合计共约 180 多种,几乎垄断了中国报界。其中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有《字林西报》、《万国公报》、《申报》等。

《字林西报》(一八五六——一九五一年),这家拥有百年历史的英文日报,创刊于上海,初名《每日航运新闻》,由北华捷报馆主办,英国商人奚安门创办并任首任主笔。一八六四年七月一日扩充为独立出版的日报,定名《字林西报》。一八六六年改由字林洋行接办。该报刊载大量广告、行情、船期等商业信息和材料。在言论版上端印有社训“公正而不中立”。创刊不久,即被英国驻上海领事馆指定为领事馆及商务公署各项公报的发布机关,并得到上海租界工部局的资助和优先刊载工部局各项文告、付费广告的特权,明确代表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反映英国政府的主张,被公认是英国在华的喉舌,又被称作“英国官报”。该报最高发行数曾达 7000 多份。

《万国公报》(一八六八——一九〇七年),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创办,一八八九年成为教会出版机关广学会的机关报。前期名《中国教会新报》,第 301 期起定名为《万国公报》。初为周刊,后改月刊。该报名义上是教会报纸,实际上阐扬宗教教义的内容日渐减少,成为综合性时事政治刊物。大量刊载评论中国时政的政论和介绍西方国家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制度和西学的文章,攻击太平天国,干预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运动。曾发表《印度隶英十二益说》文章,鼓吹“本昔之治印者,一一移而治华”,力图把中国变为殖民地。该报年最高发行数曾达到 5.4 万份,在中国上层官绅和知识分子中有广泛影响。

《申报》(一八七二——一九四九年),英国商人美

查等人合资 1600 两银在上海创办的商业性中文日报。它以谋利为目的。为了在中国读者中打开销路，它一改过去外报主要由西方人士统揽笔政和报务的传统作法，而是聘任中国人主持笔政和经营报务。《申报》重视新闻采集传播，多发社会新闻，注意满足读者需要，增加篇幅，多登广告，扩大报纸发行。在杭州、北京等 10 多个城市相继设立分销处。同时，还经营多种文化出版事业，如创办中国最早的文艺期刊《瀛寰琐记》（一八七二年十一月）中国第一个石印著名时事画报《点石斋画报》（一八八四年五月）等。一八九九年《申报》改组，成立股份有限公司。美查收回原股本 2000 股，约合银 10 万两，获得大额利润后回国。

一八七二年路透社远东分社在上海成立，这是中国境内出现的第一个新闻通讯社机构。

十九世纪外国人在华办报活动，虽然情况不尽相同，但总体上说，其主要目的是为西方殖民主义国家闯入中华帝国，抢夺市场，倾销商品，进一步使中国半殖民地化这一总目标服务的。它们制造舆论，提供情报和经济信息，炫耀西学，是配合殖民者的政治、军事侵略而进行的一种新闻文化征服手段。美国传教士、《万国公报》编撰人李提摩太在《给英驻上海领事白利兰的信》中就露骨地说，只要控制住在中国出版的“主要的报纸”和“主要的杂志”，“我们就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头和背脊骨”。中国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对外报在华的活动早有警觉。郑观应在《盛世危言·日报》中说，“每遇中外交涉”，外报往往“诋毁当轴，蛊惑民心”。王韬指责外报的言论，经常“抑中而扬外，甚至黑白混淆，是非倒置”，深刻揭示了外报对中国的危害。

但是，象征近代文明之一的外报的传入，在客观上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外报传播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思想，对长期受封建文化思想禁锢的中国读者起了一定启蒙作用，广大要求进步、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知识分子从中吸取了有益部分，借以推进维新变法事业。作为资本主义经济产物的外报，冲击了古老的邸报，显示了近代报刊的多种功能，刺激中国有识之士起而学习、借鉴，由此开始了民族自办近代报业的新的阶段。

（二）民族近代报业的孕育和出现。

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城市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加上外国近代报业普遍传入的影响，中国人自办近代报业的条件开始具备。经过一段酝酿孕育，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中国人自办的报刊终于问世。

在民族近代报业的酝酿孕育阶段，最早出现的报刊萌芽是清廷爱国官员林则徐组织编译汇集的“澳门新闻纸”和“澳门月报”。两者均为译自外报的情报材料，仅供林则徐及其个别同僚，并选呈皇帝作内部参考，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报纸。前者现存6册，译自一八三九年七月至一八四〇年十一月的英文《广州周报》等外报，后人整理汇集并题名“澳门新闻纸”。后者是魏源编著的《海国图志》一书中将“澳门新闻纸”中的部分材料整理加工而辑成的专栏文录。林则徐、魏源认为，通过译报可借以“采访夷情，知其虚实”，便于制定对外斗争策略，也有助于从中“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的这些认识和译报活动可以说是民族近代自办报业的最早萌芽。

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一些中国先进分子开始认识近代报刊的多种功能，提出民族自办报业的主张。一八五九年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在他所拟的政纲《资政新

篇》中提出的“准卖新闻篇”、“设新闻馆”和“兴各省新闻官”的详细建议，是中国人最早提出的带有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民主色彩的新闻事业建制和新闻思想理论的纲领设计。

七十年代起，民族自办的第一批近代报刊开始出现。一八七三年八月，艾小梅在汉口创办的《昭文新报》，被认为是迄今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张近代报纸。广州《述报》（一八八四年四月——一八八五年四月），是中国出版的第一张石印报纸。上海《汇报》（一八七四年六月——一八七五年十二月），后改名《报》、《益报》，是中国人在上海办的第一张日报，官商集资合办。这批报刊中，刊期最长，影响最大的是《循环日报》。

《循环日报》，一八七四年二月四日创刊于香港，王韬等组成的中华印务总局集资创办，王韬任主笔。

《循环日报》日出两张4版，内容多刊载棉纱、布匹、杂货、股市行情、航运消息和广告。但创刊不久，即在第二版新闻版的“中外新闻”栏中，首登评论，一般每日一篇，有时两、三篇。王韬主持笔政的十年中，执笔撰写数百篇言论。王韬概括该报的宗旨是：“强中以攘外，诤远以师长。”他通过言论，评论中外时局，条陈新政，系统地宣传了强中攘外、“变古通今”的变法自强思想，引起海内外广泛重视。《循环日报》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以政论著称的报纸。一八八三年，王韬把他在各种报刊上发表的言论和没有公开见报的部分文稿整理编辑出版《韬园文录外编》，是中国第一本报刊政论文集。王韬的政论风格对后来维新派政论家有一定影响。

（三）维新运动和民族办报的第一个高潮。

一八九四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战败的

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国际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加剧，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奋起变法图强。他们联合各省在京举子实行“公车上书”，组织学会，创办报刊，使维新思潮迅速发展，形成广泛的政治维新运动，从而掀起中国人办报的第一个高潮。据不完全统计，从一八九五至一八九八年，全国出版中文报刊约有一百一二十家，其中约有 80% 是中国人自办的，尤以维新派或受其影响的报刊居多，首次打破外报垄断中国报业的局面，成为推动维新运动的重要舆论宣传阵地。

维新派出版的第一批报刊有 3 个，康有为在北京创办的《万国公报》（一八九五年八月——十一月）和北京强学会机关报《中外纪闻》（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一八九六年一月），上海强学会机关报《强学报》（一八九六年一月十二日——二十五日）。在维新运动兴起的第一次办报高潮中最具影响的首推《时务报》。

《时务报》，一八九六年八月九日创刊于上海，维新派著名机关报，梁启超任总主笔，汪康年任经理。以中上层官吏和士大夫知识阶层为主要宣传对象。该报是书册式旬刊，每期约 3 万字。到一八九八年八月止，共出版 69 期。内容以翻译外报资料为主，重视言论，每期卷首刊发一、二篇政论。梁启超共撰发政论 60 篇。其中，创刊号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提出报纸是“去塞求通”的“导端”，是国君臣民的“耳目喉舌”，主张充分利用报纸传播维新思想，推动政治改革。他写的长篇政论《变法通议》，是代表维新派维新变法思想和政治主张的纲领性文献，全文 7 万字，连载 21 期。《时务报》的许多文章还宣传了“复民权”、“开议院”等资产阶级民主政治

观点。它初销 7000 份，最高达 1.7 万份，居当时国内报刊发行数首位。

《时务报》不仅是维新派的宣传舆论机关，而且还是维新派的组织联络基地。不少学会团体设在馆内，每日来信来访者络绎不绝。一八九七年十一月梁启超被排抑离去。第 55 期后的《时务报》，在汪康年主持下变成洋务派的喉舌。

在《时务报》的带动工，各地维新派纷纷立会（指组织团体）、办学、出报。其中主要有：

澳门的《知新报》（一八九七年二月——一九〇一年一月，共出 133 期），初为五日刊，后改旬刊，半月刊，是维新派在华南地区的舆论阵地。康有为等集资创办，徐勤等负责编撰，康广仁任经理，梁启超写《知新报叙例》。它借助澳门特殊环境，敢言内地报刊所不敢言。其经济实力雄厚，出刊较久。

长沙的《湘学新报》（旬刊，一八九七年四月——一八九八年八月，共出 45 册）和《湘报》（日刊，一八九八年三月七日——十月十五日，共出 177 号），是维新派在华中地区的舆论阵地。唐才常任两报主笔，他撰写大量战斗性政论（笔名洪辩子）。谭嗣同是《湘报》的主要编撰人，他写的发刊词《湘报后叙》，提出报纸是“民史”、“国口”，是“助民日新之具”的观点，该报以“开风气，拓见闻”为主旨，发行五六千份。

天津的《国闻报》（日刊，一八九七年十月二十六日——一八九九年二月），维新派在北方地区唯一的舆论阵地，为严复和王修植等集资创办，实际主笔严复。严复在发刊词《国闻报缘起》称，该报主旨是在沟通中外上下之情。该报增出《国闻汇报》旬刊 6 期，其中连载的

严复翻译的著名《天演论》，成为变法图强的思想利器。

维新派办报的呼吁和实践，促使光绪皇帝在颁发的维新变法上谕中，公布有“报纸一律免税”，“准许自由开设报馆”等宽松条令，于是官绅士民等各界人士纷纷办起大批报刊。这些报刊以时政性综合报刊为主，也有一批各具特色的知识性、专业性、对象性报刊，还有白话文报刊。其中有中国最早的文摘性报刊上海《集成报》（旬刊，一八九七年五月）和《萃报》（周报，一八九七年八月），中国第一份妇女报上海《女学报》（旬刊，五日刊，一八九八年七月），中国第一份医学刊物温州《利济学堂报》（半月刊，一八九七年一月），中国第一份数学刊物《算学报》（一八九七年七月），中国最早的白话报刊上海《演义白话报》（日刊，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和《无锡白话报》（一八九八年五月），还有文艺小报《指南报》等。

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一日，清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发动政变。十月九日，慈禧下旨查禁全国报馆，严拿主笔。变法维新运动中出版的报刊大部分被查禁或被迫停刊。

维新派报刊首次打破外报垄断中国报业的状况，成为中国近代报业的中心。它们冲破两千多年来封建专制统治的言禁，最早进行了争取思想自由、言论出版自由的斗争，向读者进行了变法图强和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宣传，它们有关近代报业的实践经验和初步论述，特别是对报刊政论的重视，“时务文体”的创新和大批著名政论家王韬、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徐勤、欧榘甲、唐才常、谭嗣同、严复等的涌现，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